

海內外作者關於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的文章，本刊將從速刊出。

——編者

去中國化的「諍友」思考

何包綱在〈「諍友」能否成為一種外交原則？〉（《二十一世紀》2011年2月號）一文中，敏銳地觀察並分析了「諍友」一詞被陸克文 (Kevin M. Rudd) 提出並上升為一種外交原則的現象。筆者對「諍友」成為一種外交原則的可能性提出質疑。

如何文所提及，「諍友」在中國傳統中是指「對缺點、錯誤直言相勸的朋友」。若在國際關係中推廣此概念，首要問題是：我們是否享有一個普世的價值體系來判斷對錯是非？如果目前的國際社會尚不能就此達成共識，那麼以「諍友」的身份進行規勸甚至批評，往往難以為對象國家所接受。

從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角度出發，何文闡述的「諍友」概念的五點特性恰恰可能導致其不可實現：

第一、「諍友」要求「人們先建立朋友關係」，但在當今權力政治仍然大行其道的國際體系中，即使各國官方政策宣稱彼此建立了各種「友誼」，卻不能等同於人與人之間的「朋友」關係。第二、「諍」的最大特色在於誠；但如果雙方是否是「友」都尚未可知，那麼何以鑒定「誠」呢？第三、「諍友」往往限於小範圍內，不對大眾公開，但是在國際政治舞台，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特別是多邊外交場合中，這一點實難做到。第四、「諍友」是「憑着道德理性」來進行辯論，「往往基於人性善的假設」；這顯然與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前提假設相悖。最後，「人們往往在政治立場上不同，但仍能成為諍友」。但在國際政治中，國家間的分歧和矛盾卻遠非政治立場不同那麼簡單。現實中國家利益的摩擦和競爭為「諍友」實踐的成功增添更多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筆者大膽地以為也許沒有必要把「諍友」的概念和實踐放在「中國文化全球化」這樣一個中國本位的框架下去思考。如果有朝一日能夠形成一個成員之間互為「諍友」的國際社會，那麼這到底是中國文化復興的標誌，還是一種新的、更進步的全球文化的產生，其實並不重要。

趙宇 倫敦
2011.3.9

百年清華還缺甚麼

唐少杰的〈水木風雨，清華百年〉（《二十一世紀》2011年2月號）梳理了清華大學建校以來的百年歷程，特別着力於「清華精神」的探尋。

作者的核心關切在於百年清華積澱了甚麼？存在怎樣的缺失？從建校算起，清華雖經歷了一百年，但在內外變局的交相作用下，真正屬於它的發展時間相當有限。清華精神的虛弱無疑將嚴重影響清華進一步發展，文章指出有志於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清華所缺失的恰恰是世界一流大學的精神。

在作者看來，補缺之道在於有着強烈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和實用價值氛圍的清華，需要不斷地通過人文主義、理想主義和普世價值來加以會通或互補。清華在整體上或深層次上缺失的正是人文底蘊。筆者以為，補這個缺需要內外兼修，於內應呵護清華已有精神資源中的精華部分，於外需要一個有利的大環境。歷史證明，不折騰、少干擾，清華就能很好地發展。

清華百年，也是辛亥百年，兩個一百年之間不僅僅是機緣巧合，更多的還是歷史深處的內在關聯。百年清華的積澱中所缺失的也是中國大學所缺失的，同時還是我們這個國家所亟待長進之處。

王龍飛 武漢
2011.3.3

網絡輿論的新視角

沈旭暉的〈中國網絡社區的非洲觀〉(《二十一世紀》2011年2月號)開創了漢語文本研究網絡輿論和來自網絡民意的新視角,而且選擇了一個對無論何種政治傾向的網民來說都相對冷僻的政治議題。儘管中國的網絡在政府的管制之下,網絡這一領域研究的研究條件和方法使得其實證的信度大打折扣(沈文也承認這一點),但定會給內地讀者新啟示:

一、該文提出,中國在爭奪非洲的自然資源、對非洲的資本輸出,以及外交上與眾多非洲國家構成對抗西方的戰略夥伴關係——三個方面戰略成功,使中國在西方看來「其實是近十年來在非洲獲利最多的國家」。這一議題是自由主義派知識份子即使知道也不太願意提起的;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衰退,也標誌着中國民主化的外部國際要素的衰退。

二、鄙視非洲和非洲人的心態是民族主義、民族國家誕生以來,把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作為激勵、控制國民的意識形態的必然結果。科恩(Hans Kohn)把民族主義分成西歐(內在自發,帶有個體自由主義成份)和東歐(外來刺激、激發群體怨念反抗)兩種。後發的東亞的民族主義大致也可以歸入東歐那類。昔日日本軍國主義打倒英美的背後,隱蔽着一種後發的自卑情結。但是在今天,經歷1960年代的獨立浪潮後的非洲,已經沒有當年「日韓統一」、「滿洲國獨立」可以給大多數日本國民普遍開拓一個獲得個人利益機遇那樣大的新天地。所以,網絡上激進

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網民也會發出反對、不滿的聲音,這種聲音與國內經濟上的階層對立呈現對應關係。

孫傳釗 上海
2011.3.2

中國鄉村的兩種敘事

二十世紀中國民主革命(經濟領域以土地改革為代表)、社會主義革命(經濟領域以集體化為代表)的歷史敘述,大致可分為革命敘事和現代化敘事兩種,分別以《翻身——一個中國村莊的革命紀實》(*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簡稱《翻身》)和《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簡稱《鄉村》)為代表。

革命敘事說明土改和集體化的必然性及其在國家、民族、歷史進程中的巨大意義;而現代化敘事則認為土改使已經十分脆弱的農村社會秩序陷於混亂。

常利兵的〈集體化時代中國鄉村問題:敘事話語與歷史真實〉(《二十一世紀》2011年2月號),是作者仔細梳理兩種學術觀點的結果。革命範式與現代化範式在解釋同一歷史現象時何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斷?作出這種判斷的真實背景又是甚麼?常利兵細緻地開列了韓丁(William Hinton)與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等人的相異所在。

《翻身》似乎是對帶血的玫瑰般革命的緬懷!這樣的記憶,可以重新打撈,但不能再起。從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出發,《鄉村》對今天的中國仍

然有巨大的借鑒意義,它突出反映了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合理性。《鄉村》結論的語言是批判性的,但絕不是悲觀的。著者看到了改革開放後出現的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希望端倪。

李翔 廣州
2011.3.6

「兩個中間地帶」戰略思想

趙穗生的〈中非關係的發展與西方國家的反應〉(《二十一世紀》2011年2月號),通過檢視中國和非洲國家的交往,省思兩個問題:西方對中國的批評在甚麼程度上是合理的?中國如何回應西方的關切?結論是:「無論這些批評者是否懷有偽善的動機,這些觀感大致上緣於中國在非洲不同於西方的行事方式」和「中國對西方批評的反應非常微妙」。

筆者認為,在二十一世紀思考中國的對非戰略,我們是否應回想毛澤東於1946年就提出並在1963年再次闡述的「兩個中間地帶」戰略思想?至於這種戰略思想現在是否仍有益於中國對非戰略的思考,只要想想突尼西亞從2011年1月14日「茉莉花革命」持續至今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幾乎未受直接影響這一現象就應該心裏有數了。要知道,在國際政治思想中,「新穎獨特未必是優點,年代久遠未必是缺點」(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語)。

鄭建成 廣州
2011.3.5